

● 主编 孙昌熙 朱德发



# 中国现代 文学史新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 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

主编 孙昌熙 朱德发

宁夏人民出版社

51 司

## 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

孙昌熙 朱德发 主编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75 字数：470.4千

1987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8,000册

ISBN 7-227-00103-2/I·24

统一书号：10157·283 定价：4.10

# 高中语文升类阅读

## 副 主 编

王才路 吴国群 周仲器 臧思钰

## 编 写 者

卜钊先	王才路	王定孝	孙自筠	李计谋
李春林	李美溶	李道尧	朱纪鹏	朱焕文
余凤高	陈学新	吴国群	周仲器	周治杰
周 音	周溶泉	赵 贝	姜静楠	徐越化
常祖淑	游友基	程仁章	翟大炳	臧思钰

(以上均按姓氏笔画为序)

## 前 言

文学观念是构筑一部文学史的关键，即有什么样的文学观念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念越正确文学史就越富有真实性和科学性。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我们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作为总的指导思想，以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文学观作为具体纲领，着重从文学与人的关系来考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从而展示它的本质面貌。

最早提出哲学人学思想的哲学家是费尔巴哈。在他看来，哲学应当把最能激发人的情感的事物视为自己的对象，而人就是这样的对象。他曾公开宣布：“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因而也将人学连同自然学当作普遍的科学”。<sup>①</sup>然而，费尔巴哈毕竟不能突破旧哲学的眼界，作为一个朴素的感觉论者他不能象马克思那样向外深入到人的社会生活。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直观的抽象的理解，继承了他的哲学人学的思想，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理论。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历史的人”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而哲学的真正使命是人的解放。正是他深刻指出的：“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sup>②</sup>即“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sup>③</sup>。马克思主义既把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他的社会性、实践性和群体性；又认为“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性，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现实存在的直观和

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④马克思主义人学观是辩证的，即人是个体和总体的辩证统一，是社会性和自然性的辩证统一，是思考和感知环境的社会主体及受影响于社会环境的生命主体的辩证统一；也就是具有自主意识和自身价值的活生生的人，是遵循自己的意志、愿望、追求和逻辑行动着实践着的人，是一个进入必然王国并达到自由王国的人。即使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真实的集体”也是“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⑤。高尔基较早地把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引进文学领域，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命题，它连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论一起，不仅对文学创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文学史研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社会的主体，作为人学的文学当然也应该把人作为主体；不过文学的主体应包括创作主体、对象主体和读者（接受）主体。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期，尚未完全获得历史唯物主义人学观的矛盾就从文学和人的关系的角度考察了中西文学史，写出了《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1921.10）的名文。他认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根本就没有解决好文学与人的关系，不论创作主体、对象主体或接受主体都没有在文学上取得独立的资格，所以也没有产生真正的人的文学。就文学创作者自身来说，即那些词赋之臣，常常被帝王视为粉饰太平的装饰品，所谓“待诏金马之门”，名称虽动听，实是帝王的“弄臣”；至于那些达官贵人富商土豪可以用金钱雇用文学之士，舞文弄墨，以装点门面，附庸风雅。可见，“在中华的历史里，文学者久已失却独立的资格，被人认作附属品装饰物了”。就居于正统地位的古代文学来说，大都是“替古哲圣贤宣传大道理”、“替圣君贤相歌功颂德”等，既不反映广大平民的人生又不表现人类的真实感情，所以这种“文学是和人类隔绝的，是和时代隔绝的，不知有人类，不知有时代”。与中国古代

文学相比，茅盾发现西洋文学虽也经过一个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但是“他们不曾把文学当作圣贤的留声机，不知道‘文以载道’”，“他们却发现了一个东西叫作‘个性’，次第又发现了社会，国家，和民众，所以他们的文学，进化到了现在的阶段”。所谓“个性”发见，就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人的发现”，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激荡和对人研究的深入发展，西欧出现了一代代的各具独特形态的“人的文学”。鉴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训和欧洲文学进化的经验，茅盾在对文学与人的关系作出自己的解释（有片面性）后，明确地提出了“人的文学——真的文学”的观念。虽然他提出的“人的文学”观晚于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命题，但是他对“人的文学”的解释却不同于周作人的。如果说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是立于以个人为人间本位的人道主义之上，那么茅盾则着重强调“文学作品中的人也有思想，也有感情，但这些思想和感情一定确是属于民众的，属于全人类的，而不是作者个人的”。<sup>⑥</sup>虽然他们对人的个体和总体之间的关系缺乏辩证的理解，但都认识到文学是人学，人是文学的主体，文学所表现的是人的生活、人的感情、人的理想。尽管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思潮或“人的文学”创作尚未达到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高度；但随着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作家所接受，随着对人的本质认识越来越接近或达到历史唯物主义人学思想水准，那些站在时代前列顺应社会政治环境需要的文学家们便对文学对象主体进行了一次次的历史选择，而每一次选择都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层次。不管是五四时期提出的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学、以平民为主体的文学，或者是三四十年代倡导的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文学、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文学，乃至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文学，就其本质来讲都是不同形态和内涵的“人的文学”。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从形成到发展的三十多年，作为社会主体和文学主体的中国人民经受了尖锐复杂的思想革命、阶级斗争、民族斗争、

政治革命等火与血的洗礼，所以始终把争取自身解放、民众解放、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作为崇高的历史使命，这就给不同内容的人的文学带来独特的色彩。

基于对现代文学这种整体性的思考，我们首先对这部文学史的体例作了新的调整，不再把三十几年的现代文学按照某一标准划分为若干历史阶段，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有序的整体动态系统来把握。全书分为“开篇”、“正篇”、“末篇”三大部分。

“开篇”着重从文化意识和文艺思潮的角度，纵横结合地勾画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演变轨程，并展示新文学发展的规律。“正篇”是本书的核心，按照体裁分成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四大创作系列，完全打破了作家论的传统格局；而每一个系列又依据风格、流派、题材分成若干章，将宏观审视的概述与微观考察的抽样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借以显示“中国现代文学是个多元系统结构”。这样安排虽然把同一个作家的创作分散到各个系列，不利于对作家的整体性了解；但对于全面地系统地把握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却是大有裨益的。因为最足以显示新文学实绩和展示创作规律的是文学作品，尤其那些象征意蕴丰富和艺术完美的代表作将经受住历史的长期考验，故作了抽样的深入分析。“末篇”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它既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以照应或补充“开篇”或“正篇”的内容；又是对当代文学的展望和预测。这三大部分并非各自为政，而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学史体例。

根据全书的指导思想和体例特点，在“编写大纲”中作了如下规定：

“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思想和‘文学是人学’的观念，着重从文学与人（包括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小我与大我等）这个视角来审视和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所编著的文学史应是人性解放的形象史，人生奋斗的形象史，民族解放的形象史，阶



级斗争的形象史，现代国人灵魂的衍化史。

“二、‘开篇’要求写清自晚清文学改良到五四文学革命在中西文化不断撞击中以人的发现为核心的现代意识的获得并逐步向以阶级、民族为本位的群体意识转化的轨程，以及伴随着文化意识所产生的以个体或群体为本位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的不断演化的轨迹。

“三、每个新文学系列的‘概貌’，要求将纵向和横向考察结合起来，纵向上应写清本系列文学发展的阶段性及轨迹，特别要重视文学规律的揭示；横向上应写明本系列的总体审美特征，特别要突出本系列文学的创作主体和描写（或表现）形象在个体意识或群体意识上所达到的人性深度，并要把在专章中涉及不到的曾在历史上产生过影响的作家作品带进去。

“四、每章的文学抽样评述，都要以‘人的文学’观念为总的价值判断标准，可以从多角度或选取某一角度，运用不同的批评模式进行评析，特别应该多用美学的和心理学的批评模式。每章文学抽样分析，先从总体上概括这类文学或这派作品的共同特色，然后对每个作家的代表作的艺术个性即独到之处进行深入的开掘，特别要突出其对中国新文学的独特贡献，并照应这类或这派文学作品的共同特征；在评述中要抓住特色，那就必须进行横向比较，既要写出这个作家作品与他作家作品的相通点，又要写清他们的不同点，并指出主客观原因；抽样分析应把创作主体意识和作品内涵、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不仅章与章之间要互相照应，既不要各自为政，也不要互相重复，而且系列与系列之间也要互相贯通，把整部文学史作为一个有序的结构系统来把握。

“五、“末篇”既要从历史唯物主义人学思想和‘人的文学’观出发，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揭示艺术创作规律，又要在‘人的文学’观念烛照下来考察当代文学的认同和

超越。

“六、对文学现象、社团流派、文艺思潮以及作家作品的评述，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政治性的定性判断要慎重，更不要轻易地戴上‘反革命’或‘反动’的政治帽子，不要把复杂的文学现象或多功能的文艺作品简单化。

“七、不论是‘开篇’‘末篇’或是‘正篇’的文学系列，在评述过程中既要注意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批判继承，又要重视外国文学的有益影响和作家的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中西文化、文学的交流，没有‘拿来主义’的贯彻，就没有中国现代‘人的文学’的诞生与发展。”

如果要问这部文学史有什么特色或者有什么突破，那从上述的体例设想和编写“规定”中便可以窥测出来。虽然在编写过程中，全体执笔者和负责通稿者尽力按照大纲要求、遵循总的指导思想，去完成各自分担的书稿任务；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稿件质量的不平衡是难免的。但值得欣慰的是大部分书稿写得较好，既有深度又有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本书的基本特点。限于水平的差异、时间的促迫，误漏在所难免，祈请专家和同志们指正，容后修改。

这里，谨向支持本书编写出版的各协作单位，特别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郑观年同志，表示深切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孙昌熙 朱德发

注：①《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④《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⑤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⑥《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

# 目 录

## 开篇 中国现代文学的演变历程

- 一、东方之子的觉醒与人的文学的诞生……………( 1 )
- 二、阶级、民族意识的高扬与人的文学的多向发展 ……( 19 )
- 三、阶级、民族观念的强化与人的文学的变革……………( 38 )

## 正篇 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系统结构

### 第一编 小说系列

宏观审视：新小说发展概貌……………( 52 )

微观考察：新小说抽样评述……………( 78 )

第一章 中国现代小说的宗师鲁迅……………( 78 )

第二章 为人生的小说(“问题小说”和  
“乡土小说”等)……………( 99 )

第三章 为艺术的“表现自我”小说……………( 126 )

第四章 矛盾的“社会分析”小说……………( 140 )

第五章 巴金的家庭题材小说……………( 159 )

第六章 老舍的市民人生小说……………( 173 )

第七章 现代派小说……………( 186 )

第八章 革命功利小说……………( 196 )

第九章 抗战小说……………( 207 )

第十章 工农兵题材小说……………( 220 )

第十一章 通俗小说……………( 234 )

第十二章 历史小说·····(245)

## 第二编 诗歌系列

宏观审视：新诗歌发展概貌·····(254)

微观考察：新诗歌抽样评述·····(270)

第一章 初期白话诗·····(270)

第二章 一代诗风的开创者郭沫若·····(281)

第三章 小诗体、湖畔诗派等人的诗·····(293)

第四章 新格律诗派的诗·····(303)

第五章 象征诗派、现代诗派的诗·····(315)

第六章 政治抒情诗·····(328)

第七章 自由诗的新发展——艾青等人的诗·····(339)

第八章 民歌体叙事诗·····(354)

## 第三编 戏剧系列

宏观审视：戏剧文学发展概貌·····(362)

微观考察：戏剧文学抽样评述·····(379)

第一章 问题剧·····(379)

第二章 浪漫剧·····(387)

第三章 曹禺的话剧·····(396)

第四章 社会剧·····(409)

第五章 抗战剧·····(419)

第六章 历史剧·····(429)

第七章 暴露剧·····(439)

第八章 讽刺剧·····(449)

第九章 新歌剧·····(457)

## 第四编 散文系列

宏观审视：散文发展概貌·····(464)

微观考察：散文抽样评述·····(482)

第一章 杂感体散文·····(482)

第二章	小品散文	( 495 )
第三章	抒情散文	( 506 )
第四章	叙事散文	( 519 )
第五章	报告体散文	( 531 )
第六章	纪游体散文	( 547 )

## 末篇 历史的积淀与当代的选择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反思	( 563 )
二、当代文学的认同与超越	( 580 )

## 开篇：中国现代文学的演变历程

当我们试图说明中国文学的现代阶段时，不能不意识到我们是在探溯着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全新的航程。它既有源远流长的上游，又以壮阔的波澜和卓具个性的民族特色历经曲折，而最终汇入了世界文学的海洋。马克思主义早就为我们提供了打开每一座民族文学迷宫的钥匙：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84.1.25）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正是在这一文学哲学原则的观照下，我们力求在不离开文学本身特殊规律的前提下，对我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的历程及其为当代提供的历史经验作出宏观的审视。

### 一、东方之子的觉醒与人的文学的诞生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产生和发展着的中国古代正统文学，实

质上是一种以“载道”为宗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功利文学。这种文学的最高审美理想和审美原则是“中和之美”，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击谓之和”<sup>①</sup>，即是要求压抑人的天性，取消人的价值，使之合乎纲常名教的规范。但是，既有治者的文化，就必有被治者的文化，且不说“在不识的大众里，是一向就有作家的”<sup>②</sup>，即使是在士大夫的作家里，亦是历来就有倾向人民的作家的，他们的作品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文学的进步潮流。

### （一）明清以来人的文学意识的孕育。

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自明中叶后逐渐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哲学思潮和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明代思想家李贽猛烈攻击禁灭人欲，以儒家固定不变的道德伦理作为是非标准的封建礼教；并一反传统的文学价值观，不仅将一向被贬于“正宗”之外的小说、戏曲跟诗、文相提并论，而且旗帜鲜明地褒扬那些张扬人性、发愤叛逆之作。相继出现的传奇《牡丹亭》、小说《金瓶梅》以及众多的话本小说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反礼教、扬个性的色彩。稍后的公安派，在反对文学上的拟古主义的同时，更从作家的主观要求提出了“性灵说”，倡导文学的“真声”和“任性”。可见，李贽和公安派在文学思想上均已触及“人”的个性解放问题。

到了清代，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以民主思想为武器，对封建社会进行尖锐的批判，强调“文须有益于天下”，已注意到文学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从《聊斋志异》、《镜花缘》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从《清忠谱》、《长生殿》到《桃花扇》等戏剧创作，文学的社会意识有了显著的增强。

从李贽到顾炎武，中国文学在呼唤强化“个性”和“社会性”的交响中，逐步出现了一种与“文以载道”的封建正统文学观截然相反的二元对立统一的新的文学自觉意识的萌芽。

## （二）近代的文学改良——人的文学的胎动。

到了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sup>③</sup>。这一时期，一方面是中国的封建经济已逐步解体，作为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封建正统文学也无可挽回地进入了衰退时期；另一方面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进步文化遗产，随着列强的入侵传入了一向闭关自守的东方古国，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为祖国与西方的巨大历史差距而震惊，同时也获得了睁开眼睛观察世界，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机会。“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sup>④</sup>。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表征的文学，自龚自珍首开新风，开始了超越传统的努力，历经王韬、康有为等人的推动，至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陈荣衮、裘廷梁等倡导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崇白话而废文言”，汇成了中国近代的文学改良思潮。

文学改良的倡导者们对内侧重于继承清初顾炎武等人的文学社会功利观；对外则主要输入欧洲资产阶级的启蒙文学，从政治改良的需要出发，揉合成自己的文学改良观。这种文学观念，既有别于封建正统的文学观，又未能与之实行彻底决裂。以这种观念指导的整个文学改良运动，则呈不稳定、不成熟的过渡形态。然而，倡导者们毕竟把“东渐”的欧风引进了“万马齐喑”的封建中国，使早就孕育在母腹中的人的文学终于有了可喜的胎动。

由于内外矛盾的骤然激化，出于自强救国的急切心愿，倡导者们不能不特别重视文学的社会性，资产阶级的政治功利的价值标准被提到了突出位置。梁启超把小说的社会功能提到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兴一国之小说”的“国民之魂”的地位<sup>⑤</sup>；黄遵宪则认为诗歌“竟有左右世界之力”<sup>⑥</sup>。强烈的社会意识，使



倡导者们急切要求文学能成为他们宣传社会改良思想的普及性工具。于是文学形式的改革成了他们倾力的重点。倡导者们的这种努力，一方面固然体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文学家特别强烈的社会意识，有益于从屈原到现代作家之间在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传统方面的承传，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先河；另一方面则由于不适当地抬高文学的社会功能，也给现代文学带来了不少模糊的认识。尽管如此，文学改良的倡导者们还是从西方引进了“人”和“人的文学”的新观念。《新民丛报》一九〇二年第十四号刊载的关于《新小说》的广告就认为小说能“曲折透达、淋漓尽致，描人群之情状，批天地之窾奥”；梁启超认为小说的作用在于“支配人道”，因为它所描写的原是人所经历的乐、哀、怨、怒、恋、骇、忧、惭等境界，所以能通过“熏、浸、刺、提”四种途径产生“移入”效果<sup>⑦</sup>。另一位小说理论家夏曾佑则已明确站在人性论和历史哲学的高度，要求小说描写英雄男女的“公性情”<sup>⑧</sup>。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小说理论家徐念慈更是从美学角度要求小说塑造富有个性的人物典型形象<sup>⑨</sup>。在诗歌方面，“诗界革命”的先驱者龚自珍早就受个性解放观点影响，提出了“尊情”、“宥情”的要求，把充分抒写“人”的真情实感和完满地表现个性风貌作为诗歌创作的首要条件<sup>⑩</sup>。“诗界革命”的代表诗人黄遵宪则明白要求“诗之中有人”<sup>⑪</sup>。裘廷梁说得更明白：“有人而后知物，有物而后有文。”<sup>⑫</sup>凡此，均已试图将“人”放到文学创作的中心位置。

“人”的意识，推动了文学自觉意识的出现。这不仅表现在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文论以诗、文为正宗而轻视更善于写人情世态的小说、戏曲的价值标准，把小说、戏曲提到了正宗地位，把文学批评的参照系统由“道”或“时”、“事”改变为“人”的生活，从而把文学从“文以载道”的封建附庸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视之为具有无以旁贷的独特